

中华诗文蕴含中华文明的精髓要义

□主讲人：刘宁



▲刘宁

诗文对中华文明的重要意义

中华文明博大精深，数千年来，内涵丰富的中华诗文传统对于推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，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。古人云：“诗者，天地之心也”“盖文章，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。诗文是中华文脉的核心载体，是传统士人的必修课，它并非一般的辞章之学，而是发挥着养成心灵、化育天下的重要作用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与魂，要善于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。诗文传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，是中华文明的灵魂所系，传承发展诗文之道，对于赓续中华文脉具有重要意义。近代以来，随着中国社会经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，中华诗文的传承发展经历某种曲折；当前网络新媒体传播的流行，对诗文传统的弘扬也面临某些误区。这些问题需要站在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加以重视和反思。

高度重视诗文是中华文明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重要特点。诗文对中华文明精神文化建构的意义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：

首先，诗文孕育中华文明的主体心灵。

人是文明的主体，是文明的创造者和推动者。中华文明代代相传，不断开拓创新，离不开一代代中华儿女的担当与创造。中华诗文对孕育丰沛的心灵、塑造独立担当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古典诗文追求作者主体心志的真诚表达，《毛诗序》主张“诗言志”，提出“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”。词论家主张“真为词骨”，强调作者要真诚地表达内心，不应流于虚伪。言为心声，始终是诗文创作最受推重的原则。被誉为“诗圣”的大诗人杜甫，以“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存心

知”自道创作心志。他认为自己的作品，要接受历史的检验，绝不会被一时尚好尚所左右。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，被后人誉为“百代文宗”，他同样表达了不苟流俗的坚强信念。他说要达于文章至境，必须“望其速成，无诱于势力”（《答李翱书》），要摆脱外在干扰，专心涵养，要超越眼前的毁誉，尤其要在人们的赞扬声中保持清醒。中华诗文的一篇篇佳作背后，正是无数这样丰沛的创作心灵。前代诗论家称赞唐诗的繁荣：“家家怀和氏之宝，人人握灵蛇之珠。沈、宋之典重，四杰之雅丽，李、杜之雄浑，王、孟之闲适，卢、李之险怪，韩、孟之高亢，张、王、元、白之工于序事，温、李、冬郎之善于言情，美矣备矣，蔑以加矣。”（《王文濡《唐诗译注读本序》》）这是艺术风格的多样，也是诗家心灵性情的丰富。唐宋八大家的古文传诵后世，“八大家”也各具风格，韩愈之雄奇开阖，欧阳修之平易自然，苏轼之

才情焕发，王安石之简劲峭折。诗文作者丰满充实的精神主体，在创作中得到充分展现。无数读者诵习诗文，其心其情与作者相通，自身的胸怀襟抱也得到涵养与陶冶。诗文让人与人相知，让心与心碰撞，从而养成人才、造就文明传承创造的主体心灵。

第二，诗文传承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。

中华诗文追求风雅之道，追求文以明道。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，通过诗文的传习创作而代代相传。杜甫追求“别裁伪体亲风雅，转益多师是汝师”（《戏为六绝句》其六），他的诗歌表达了“志在天下的人生信念、推己及人的仁爱境界，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、沉重深广的忧患意识”（参见莫砺锋《杜甫评传》），其“安得广厦千万间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的胸怀，激励了无数士人。李白的天真豪放、清新自然，表达了中华民族对自由精神的向往。他的浪

漫主义精神是“热情的、积极的……这是属于人民的歌唱”（参见林庚《诗人李白》）。王维空灵自然的山水诗，体现了中华文明对自然与自我的深邃思考。在文的领域，韩愈以“文起八代之衰，道济天下之溺”的气魄开创古文传统，其古文以拟圣精神，定名追求、绝对信念、勇毅激情建构了“同道中国”的文明理想。“同道中国”超越乡土家族、身份门第的束缚，展现了中华文明开阔而普遍的视野，理解中国，我们既要看到费孝通先生立足乡土社会所揭示的“乡土中国”，也要看到以古文为代表的中华文教所建构的“同道中国”。韩愈古文被欧阳修、苏轼等古文家接续开拓，形成以唐宋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，随着古文在千年间的代代传诵，“同道中国”的精神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文化气质之中，成为中华文明走向世界与未来需要认真对待的精神文化遗产。（参见刘宁《同道中国：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》）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，诗文始终担负着传承建构文明核心价值的重任，成为中华文脉的核心载体。

第三，诗文塑造中华文明的思想方式。

中国作为文教大国，其精神的创造、文化的发展、社会的进步，处处都表现出对“文”的重视。《说文解字》：“文，错画也，象交文。”不仅自然事物有“文”，社会事物亦有“文”。政治礼仪、典章制度、文化艺术，均可称“文”。人的服饰、语言、行为、动作，亦可称“文”。“文”贯通天地自然与人文社会，人文是人的创造行为所表现出的形式。南朝思想家刘勰认为“文之为德也大矣”。诗文又是人文的精华：“（人）为五行之秀，实天地之心，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，自然之道也。”

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，追求“文以明道”，其《谏臣论》言士君子当

“居其位，则思死其官；未得位，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”。韩愈对“文”的意义给予了充分重视，主张“文道并重”。其《答陈生师锡书》云：“愈之志在古道，又甚好其言辞。”在《答李固南秀才书》中说：“然愈之所志于古者，不惟其辞之好，好其道焉尔。”“文”对于韩愈来讲，表达了古文作者的主体自觉，展现了精神修养的丰富内涵，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，其《进学解》云：“先生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，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……作为文章，其书满家，上规姚姒，浑浑无涯，《周诰》《殷盘》，佶屈聱牙，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，《易》奇而法，《诗》正而葩，下逮《庄》《骚》，太史所录，子云相如，同工异曲，先生之于文，可谓闳其中而肆其外矣。”韩愈对“文”的丰富性的追求，表现出阔中肆外的气魄。

中华文明的思想方式，带有文道合一的显著特点，精神与文化、文与道，往往并不孤立强调理念的开展，而是注重在文道合一中，实现对社会生活的整体推进。诗文作为“文”之精华，深刻参与了“文道合一”的文明演进之路。

主体心灵的养成、核心价值的传承、思想方式的形塑，构成了中华诗文对中华文明的重要贡献。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、创新性、统一性、包容性、和平性都与诗文之道的涵育密切相关。诗文传统追求传承与创造的统一，杜甫的诗歌既集古今之大成，又开后世无数创造的法门；韩愈古文在“约六经之旨而成文”的同时，表现出“自树立，不因循”的创新气魄。诗文传统实现统一与包容的融合，韩愈的“文道观”，将中华道统的统一性与文的多样性相融合，建构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精神文化传统；中华文明的和平性，也在诗文以文化人的教化之道中有突出体现。

相关链接

主讲人简介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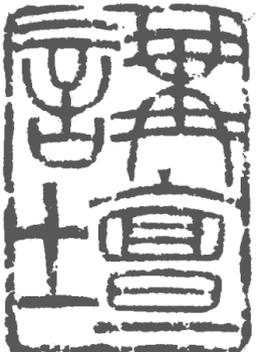
刘宁，全国政协委员，著名古典文学与文献学家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典文献研究室主任，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。主要从事唐宋诗文与学术思想史研究，著有《同道中国：韩愈古文的思想世界》《唐宋诗学与诗教》《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》《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》《王维孟浩然诗选讲》等，译著《斯文：唐宋思想的转型》，主编《诗者天地心：当代诗词名家讲诗词》，在海内外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。



扫码读讲稿

编者的话：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，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。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，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，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、与现代社会相协调，把跨越时空、超越国界、富有永恒魅力、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。中华诗文传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演进所形成的文明精髓，是中华文明走向未来的重要精神文化基础。传承弘扬中华诗文传统，推动中华诗文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，从而更好地赓续中华文脉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。本期讲坛邀请刘宁委员深入解读中华诗文蕴含中华文明的精髓要义。



走出诗文传承的盲区和误区

中华诗文蕴含着中华文明的精髓要义，深刻理解中国，离不开对诗文传统的深入把握。晚清曾国藩云：“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。”（《致刘孟容书》）近现代学者吴闿生云：“古今多少英雄豪杰，他们著作书籍，莫不极意讲求文章之精美，所有精心结撰的寓言奥义，大抵埋藏于隐奥之间，隐约于言辞之表。苟非精通文学，何能了其奥义。所以欲通国故，非先了解文学不可。”（《莲池讲学院开学演词》）中华诗文传统不是普通的辞章与歌谣，对于理解中国，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，而是所有中华文明的研究者需要给予充分关注的内容。要完成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使命，需要关注中华诗文传统的重大文明意义，从而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。这在当前显得尤为迫切。

首先，走出“诗文盲区”，才能深入理解中国。

当前有关中国思想社会和文化的研究，对古典诗文的意义关注不足，研究上的“诗文盲区”十分明显。很多研究者在开展中国研究时，忽视诗文传统的价值，甚至完全漠视这一传统的存在，将古典诗文仅仅当作一般的文献材料，缺少沉潜与体味，难以把握其精神内涵。带着“诗文盲区”来理解中国，就很难体会到中华文化的精髓。这个问题始于今日，而是深植于现代文化学术转型的内在困境。近代以来，传统诗文之学日渐衰落，新文化运动推翻“桐城谬种，选学妖孽”，其主张所存在的片面之处，消解了古典诗文的神圣内涵。现代学科体系中的文学学科，也缺少对诗文综合文化意义的关注。对于理解中国文明，古典诗文学的意义日渐边缘，很多人将其简单视为辞章雅好，无关宏旨。这是诗文学的损失，也是中国文明研究的巨大损失。20世纪阐释中国文化最为活跃的学科如史学、哲学和各类社会科学学科，对诗文传统的意义普遍缺少充分的关注，其研究的“诗文盲区”亟须突破。

此外，中外学术交流是近代以来推动中国学术前进的巨大动力。然而，古典诗文作为中国古典传统最精微的内容，在中外学术交流中往往遇到困境。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隔阂，中国古典诗文的跨语际交流困难很多，解读会遇到很大挑战，大量海外有关中国社会、思想、文化的研究，难以

充分关注中国古典诗文。当然，也有不少优秀的海外学者对中国古典诗文有很深的认识，这些学者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往往能带来深刻启发。例如，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提出“唐宋变革说”，对中外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这个学说的提出，和内藤湖南深厚的中国古典诗学造诣密切相关。在古典诗学与文章学中，唐李商隐、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”都是持续千年的诗学课题。中唐在诗学之变中的枢纽地位深受关注。清人叶燮称中唐不是“一代之中”，而是“百代之中”。他在《百家唐诗序》中说：“吾尝上下百代，至唐贞元、元和之间，窃以为古今文运诗运，至此为一大关键也。”陈衍则提出：“余谓诗莫盛于三元：上元开元，中元元和，下元元祐也。”沈曾植则云：“吾尝谓诗有元祐、元和、元嘉三关。”（《与金与丞太守论诗书》）这里都把“元和”视为诗运的重要转关期。至于韩愈大变八代之文，易辨为散，开创古文，更是文章家公认的文运转关。

内藤湖南对唐宋变革的界定，与中唐的诗运、文运之变完全同步。诗运是社会文化精神最集中而深刻的反映，诗运、文运的转关，折射了社会文化的变迁。内藤湖南是一位深通诗运的历史学家、社会学家，深厚的诗学素养，让他的社会历史研究能够深入中国社会的血脉与肌理，深入捕捉到中国变化的节奏。遗憾的是，20世纪以来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，越来越削弱了与诗文的联系，带着“诗文盲区”展开的中国思想与社会观察，固然可以理论愈发精密、论证愈发翔实，但对文化的洞见与穿透力都会减弱。在对“唐宋变革说”不断的反思中，学界提出了许多新的历史分期见解，希望关注“唐宋”之外的其他历史转变节点，但这些新见解为何没有引起如“唐宋变革”般强烈的反响？这和“诗文盲区”不无关系，这些新的思考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对诗文的关注，难以像内藤学说那样，关注到中国社会肌体的生命脉动。大量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引进，对20世纪的中国学术产生重大影响，但有些理论对于阐释中国的诗学之学，普遍存在明显局限。中外学术交流打开了观察中国社会文化的许多新视野，但这些新视野往往难以充分关注中华诗文传统，“诗文盲区”的存在，是

现代学术发展中的一个结构性困境。

现代研究者无论从社会、历史、政治、经济哪一个角度观察中国社会，倘能对古典诗文有深入体会，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人的精神，理解由具有独特精神世界的中国人所构成的中国社会。例如，韩愈古文追求“拟圣”，但绝非一味道德说教，而是以生气淋漓的情感、磅礴的气象，在凡圣相即、情理圆融中，表达道德的普遍主义和理想主义。这就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精深与精微之处，如果只将古文视为一般道兴随笔，就无法在古文的带领下，理解中华文明的精髓。

中华文明研究需要充分走出“诗文盲区”，要打破学术分科的壁垒，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应普遍增强对中华诗文传统的认识。传承和弘扬中华诗文，对于中华文明的研究者、阐释者、传播者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。这是创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可忽视的基础。

第二，新媒体传承诗文，要避免误区。

近年来中华大地掀起学习古诗文的热潮，随着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”的不断推进，电视媒体相继推出了《中国诗词大会》《经典咏流传》《中华好诗词》《典籍里的中国》等一批观众喜闻乐见的文化综艺节目，这类电视节目在中央台、地方台播出，借助互联网的传播，其影响传遍大江南北。

短视频也越来越成为诗词传播的重要方式，抖音、快手等短视频平台上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古典诗词类短视频。许多学者专家也陆续进驻B站、小红书、抖音、快手，讲解分享古典诗词。2022年6月，抖音、字节跳动公益、南开大学文学院、中华书局共同推出短视频版《唐诗三百首》。“抖音唐诗三百首”抖音号发布的74条视频，短短两个月播放量就突破4000万，点赞量高达58万。据2022年上半年发布的《抖音古诗词数据报告》显示，过去一年，古诗词在抖音上累计播放量178亿，同比增长168%。古诗词的演绎形式正日益多元化。李白、苏轼、李清照、王维、白居易、杜甫、辛弃疾、屈原、陆游、李商隐位列抖音最受欢迎的诗人排行榜前十位；《相思》《将进酒》《春晓》《琵琶行》《春江花月夜》位列抖音网友最喜欢的唐诗前五名。“00后”更喜欢将诗词与说唱结合起来，“90后”则更爱用舞蹈复现诗词之美，“80后”则更喜欢用朗诵的形式感受诗词魅力，“70后”则偏爱通过观赏戏曲理解诗词。

新媒体拓宽了诗文传承的媒介手段，通过图像、说唱、戏剧等形式传播诗词，有别开生面的效果。诗歌类短视频中还出现了“诗词串烧”“诗词rap”等新形式。这些都让诗词传播更加生动有趣。但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也容易带来一些传播误区。中华诗文是汉字所书写的汉语书面语的精华，阅读古典诗文，始终要关注汉字及汉语语言艺术这个根本。诗文的丰富意境和深邃内涵，离不开对汉字的理解，离不开对汉语语言艺术的深入把握。通过阅读生写古诗文，体会其语言艺术，可以产生丰富的联想和思考，这不应被新媒介的声光图像过分削弱。

林庚先生等学者曾指出，中国山水诗由汉字书写，汉字独特的形体结构，对山水诗艺术的建构有着重要作用。古典诗歌语言本身所引发的丰富联想，很难被完全具象化。诗歌艺术与戏剧艺术、叙事艺术有着明显的差异，将诗意改编成说唱、戏剧、故事，似乎显得更加活泼，但很可能限制了对诗意更充分的体会。诗词传播应始终注重因文见义，注重字句的讲解，诗句的吟咏，诗意的品味。当前，有些诗词传播的做法，善于创设贯通古今的诗词学习情境，引导读者去品味诗句，很见巧思，比如西安莲湖区青年路小学门口的步行道，上面书写着“再见少年拉满弓，不惧岁月不惧风”“少年自当扶摇上，揽星衔月逐日光”“鲜衣怒马少年时，不负韶华行且知”等诗句。一边是当代少

年的蓬勃身影，一边是古老诗句中的少年意气，两相融合，激发人们品味古老诗句的兴趣。新媒介的运用，应该始终以维护汉语语言艺术的神韵为根本。如果忽视了这个根本，一时火爆的传播，很可能因失去诗文恒久的语言艺术魅力，而很快被观众厌倦。

总之，中华诗文传统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演进所形成的文明精髓，是中华文明走向未来的重要精神文化基础，要深入传承弘扬这一传统，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，坚定文化自信，推进文化自强，从而更好地赓续中华文脉、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。



▲费孝通《乡土中国》



▲王维《千岩万壑图》(局部)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